

邱存平 著

现代人的 呐喊

——鲁迅的人生探求

解放军出版社

现代人的呐喊

——鲁迅的人生探求

邱存平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人的呐喊:鲁迅的人生探求/邱存平著.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ISBN 7-5065-3776-1

I. 现… II. 邱… III. 鲁迅-思想评论 IV. 1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917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6801—8000 册

定价:29.60 元

让人生充满“诚”与“爱”

——《现代人的呐喊》序

陈漱渝

人生是什么？这个问题近乎“斯芬克斯之谜”。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体验，对人生的感悟自然各有不同。比如，有人认为人生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轮子，是一个闪烁着刀光剑影的战场，或者是一个轮番上演着悲剧、喜剧、壮剧的舞台。而有人则认为，人生是一个赌场，是一条噪音不断的大街，或者是一口诱捕灵魂的陷阱。文学是人学。作家以“表现”或“再现”人生为职志。因此，作家对人生的观察必然会有其独特的视角，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有发人深思之处。

列夫·托尔斯泰就是一位以反映波澜壮阔的人生画面而闻名于世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誉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 1861 年至 1905 年间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的历史生活，特别是反映了农

民在俄国革命中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托尔斯泰，在 58 岁时还精心撰写了一部理论专著《人生论》，对“何谓人生”这样一个人类的终极命题给予了详尽的解答，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不过，对于 19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托尔斯泰主义”(tolstoism)，鲁迅一直持有保留态度。这种主义最重要的主张，是对于恶采取不抵抗主义和以自我完善作为信条，经由爱的精神，将自己奉献给全世界的福祉。然而，在鲁迅看来，托尔斯泰的设想未免过于天真——“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鲁迅虽然没有创作出像《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煌煌巨制，但他对人生却有许多精辟的看法，其中也不乏比托尔斯泰高明的见解。但遗憾的是，鲁迅并没有撰写一部类似于《人生论》的著作，将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令人高兴的是，军内的鲁迅研究家邱存平在完成《智者的思考——鲁迅的思维方法》这部专著之后，又推出了他的新作《现代人的呐喊——鲁迅的人生探

求》。这部 30 万字的著作，从 15 个方面介绍了鲁迅的生命观、人权观、价值观、是非观、幸福观、爱情观、儿童观、生死观等等，几乎是全方位地评介了鲁迅对人生诸方面的深刻见解，不仅显示出鲁迅的人生智慧，而且更展现了鲁迅的人格魅力。无论是熟悉鲁迅作品抑或是不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都可以从这部雅俗共赏的著作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我以为，鲁迅的人生智慧突出表现在他能够用唯物辩证法剖析人生历程中面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比如，幼儿丧母，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悲哀。然而 1918 年 6 月，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丧妻，鲁迅在同年 8 月 20 日的信中却劝慰说：“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意思是：儿童们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人。现代医学已经证明，鲁迅 80 年前的这种看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母亲对孩子过分关注、担忧和溺爱，必将导致天真活泼的孩子忧郁、懦弱、胆怯、任性，并对其母产生异乎寻常的依赖，从而丧失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现代医学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母子心身综合症”，或称之为“母子脆弱症”。又比如，鲁迅指出，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又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

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上述言论，看似明白易晓，实则包括了许多苦楚的人生经验。至于鲁迅对“王道”和“霸道”、专制者与奴才、信教与吃教、登仕与归隐、天才与民众、敌人与蛀虫、革新与复古等问题的看法，都是高屋建瓴，一语破的，驱散了历史上的重重迷雾，使许多扑朔迷离的人生现象赤裸裸地暴露出它的本质特征。

至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他“损己利人”的道德追求。“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的 *Persona*，原意是“脸谱”或“面具”，指的是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角色所显示给观众的脸面，代表着剧中人物的特定身份。后来在语义学上被引申为做人的格式和标准，即人的模式。理想人格就是人的理想模式。具备理想人格的人被视为道德上的完美典型。在鲁迅看来，人的道德水准可分为四个层次。最低层次是损人不利己，如强盗放火。第二层次是损人利己。这是从古至今一切剥削者、压迫者奉行的共同道德。第三层次是自他两利——这种设想自然不错，但在实践的过程中，道德砝码的人、我两端却很难做到绝对的均衡。最高层次则是损己利人。鲁迅笔下的青年作家柔石就是这一类人物：“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事实上，这同样是鲁迅的

夫子自道。在人生的道路上，鲁迅甘当傻子，用“以血饲人”的精神做青年人的梯子、踏脚石，数十年来从不息肩，惟愿英俊出于中国。对于常人向往的名声、地位，他什么都不要，连夜里做梦也没想过要做“主将”和“权威”。当受惠者对鲁迅表示感激时，鲁迅却认为不必，因为感激之情能够束缚人——“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从现世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至高智慧乃是愚拙。鲁迅这种拒绝与放弃的精神，这种对世俗诱惑说“不”的精神，不仅是他人格的光环，同时也是他人生智慧的最高体现。

在鲁迅看来，在中国人的人生中，最缺乏的是“诚”与“爱”。鲁迅呼唤“诚”，即希望人要活得真实，要做到言与行的统一，前台与后台的一致，内心与外表的和谐。如果既自欺又欺人，就会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弥漫着虚伪的空气，以致彼此无法看清对方袒露的心迹，社会发展的车轮也会陷入瞒和骗的大泽而无法前行。鲁迅呼唤“爱”，主要是针对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摧残，是针对世俗社会对受苦人的凉薄。鲁迅式的“爱”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民众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大爱”。它以摧毁“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宝塔形的等级制为前提，以强调爱与憎的有机统一为特色，与东方圣人提倡的“等差之爱”和西方哲人提倡的“人类之爱”有着明显的区分。鲁迅反伪求真，爱憎分明，不

但体现了一种纯朴美好的人性，而且在外侮频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体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救亡精神。

研究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加美好。因此，研究鲁迅的人生探求，既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意义，又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不过，鲁迅对人生的看法不仅在他的杂文中有着直接的阐明，而且在他的小说、散文诗中有着含而不露、露而不彰的表述。所以，研究鲁迅的人生探求，既应该注意他作品中显露的一面，同时也应该注意他作品中比较隐晦的一面，还应该看到他在剧烈的灵魂搏斗中没有表露的一面。我想，作者如果进一步加强对鲁迅内心存在体验的研究，这部论著也许会更加全面、更为充实。当然，这只是一种期盼，也许是一种苛求。区区愚见，仅供作者参考。

前 言

作为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先觉者,鲁迅是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一个,却又是被误解、曲解得最多的一个。鲁迅研究虽然被称为“显学”,但其研究成果却多在学界专家、学者间鉴赏,而很少为普通读者所了解。因此,要使更多的人了解鲁迅对于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意义,似乎更应做些普及的工作。我之不揣浅陋,要来写这样一本介绍鲁迅人生思想和人格的通俗读本,即为此。

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这是他一生思考和实践的主题,也是他的人生探求的出发点和归宿。有学者认为,未来的鲁迅研究,不但要重新确认他在文化史、思想上的地位,而且要“格外关注其对中国人独特人生方式的理解”。这是很有见地的。如果说鲁迅的“立人”主张是从总体上探索中国人摆脱“不把人当人”的专制统治和奴隶地位,实现人的独立、自由、解放的话,那么,他的人生探求和“做人之道”,则着重从个体的角度,研究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创造,以实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目标的。可以说,“立人”是“做人”的思想基

础,“做人”则是“立人”的具体实践和落实。

鲁迅的人生探求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而是从中国人的非人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以他习用的“由非见是”的思维方法,从他对非人状态的批判中来探寻“理想的人格”和实现“合理的做人”之道的。例如他从批判专制“吃人”的“仁义道德”和“巧人”的“死的说教”中,提出了“生命第一义”的价值观;从批判“灭人欲”和“安贫乐道”中阐述了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权利;从批判奴性、依附性和信命说中,强调了做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人生的创造性;从批判扼杀人性与个性的文化专制和“以众虐独”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中,阐述了“尊个性而张精神”和“张大个人之人格”的意义;从批判“做戏的虚无党”的普遍虚伪和“二重人格”中,提出了“做人要真实”的准则;从批判“惟无是非观”和“寻开心”的生活法中,强调了“能憎才能爱”的分明的是非、爱憎观;从批判封建“孝道”和“节烈”等祖传的“昏乱思想”中,提出了解放子女、解放妇女和“牺牲于后起新人”的责任等等。可以说,鲁迅所探求的“人生之道”,是一种变革之道,抗争之道,创造之道,而与祖传的苟活之道,依附之道,乞求之道相对立的。它的革命性和现代性,正体现在对传统的奴役和奴性之道的批判与决裂之中。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鲁迅所主张的“立人”,实质上就是要使做了几千年奴隶的中国人成为摆脱传统专制的现代人!虽然他早期著作中常用的是“真的人”,“新的人”,“觉醒的人”,“独立的人”,“完全的人”等等提法,但其所蕴含的区别于“传统人”的现代人的涵义却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在鲁迅看来,现代人,“合理的做人”,至少应该是获得了人格独立与尊严,“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而不再是受奴役或奴役人

的人；应该是“生活上也像了人样”，生存、温饱有了充分保障，而不再是牛马蝼蚁般在贫困中挣扎苟活的人；应该是精神上自由解放，个性和才智得到全面发展和发挥，而不再是愚弱、麻木和虚伪的只配作“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人；应该是具有人类意识，能“洞达世界之大势”，“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的“世界人”，而不再是“眼光囚在一国里”，以“保存国粹”、盲目排外为“爱国”的人等。在我看来，鲁迅自己便是中国最先觉醒的这样一种现代人，而他所探求的“人生之道”，也就是呼唤中国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之道。所以我把这本书题名为《现代人的呐喊》。

鲁迅的“立人”思想和“人生之道”，自有其形成和发展过程。虽然他注重“别求新声于异邦”，多受外来的新思想，特别是尼采、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人格的影响，却也不乏传统的“中国的脊梁”的优秀因素的滋养。古代的嵇康、阮籍等魏晋文人的风骨和近代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和梁启超的“新民说”等等，也都在他的精神、性格中留下了印迹。可以说，他的“立人”思想和“人生之道”，是在中国现实变革的土壤上，既向外“摄取异域的营养”，又向内“挖掘自己的魂灵”，因而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中外融合的产物，而与所谓“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都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说他早年的主张“立人”，还是作为一种“兴国”的手段，并且着重于“搃物质而张灵明”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之后，他就把人的独立、自由、解放作为终极目标，并为实现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实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更多地进行“人生之道”的具体探索，他的“立人”的实践性更强了。

鲁迅思想的力量，是以他的人格力量作基础的。用他的挚友许寿裳的话说：“鲁迅作品的伟大，是由于他的人格的伟大”。

大。”他不但用作品阐述他的思想,而且用他的一生实践他的主张。因此学习鲁迅的思想,更应学习他的人格。

胡风在1943年就指出,思想的力量不能不是人格的力量(行为的力量)。“要接近鲁迅这一个伟大的存在,从他底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的一面当然能够取得丰富的财产,但从他底作为思想革命的人生态度的一面更能够汲取无穷的教训。”因此,“在中国,不单是一个作家,就是一个革命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也应该很好地深入研究鲁迅。……他所揭露抨击的很多东西到今天还存在着,甚至还附在我们身上,需要我们用很大的努力去克服;而他所肯定的东西,甚至在今天也还要用很大的努力去争取。”

1965年,胡风在蒙冤十年之后,仍在狱中写信对妻子说:“读鲁迅,并不是向他取理论;……读鲁迅,是为了体验反映在他身上的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神圣的悲愤;……读鲁迅,是为了耻于做他所慨叹的‘后天的低能儿’,耻于做他所斥责的‘无真情亦无真相的人’,耻于做用‘欺瞒的心’,‘欺骗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胡风在几十年的炼狱中所表现的巨大人格力量,不正是鲁迅人格在他身上的一种延续和证明么?有位日本学者也说,“鲁迅是世界性的天才,与他已经获得世界性荣誉的作品相比,鲁迅先生被磨炼成的人格,使他获得了更加崇高的威望。”他的天才不是人人都能学到的,而他的人格,却是每个想“合理的做人”的人都应该学、都可以学的。

鲁迅只活了56岁,却经历过19—20世纪间的反反复复的“革命,革革命,革革命……”的残酷“历练”。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丰富异常又意义非凡的人生巨著。他既是专制者、奴役者的不调和的敌人,旧社会的离经叛道的“叛徒”和本阶级的“逆子”,又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劳苦大众的儿子;他既

是“争天拒俗”、超越庸众的先驱，又是参悟人生、洞明世事的智者。可以说，他的深刻思想和“人生之道”，是用许多先烈和青年的血换来的，没有他的阅历、体验者，视他为“异类”、为“人群的蠹贼”者，是不容易读懂他，不可能理解他的。

有人认为，鲁迅死了几十年了，他的思想，他的“人生之道”，都是在黑暗年代形成的，现在是新时代了，还需要鲁迅精神，还要学他的人格么？例如有人这样说：“鲁迅在当年是作为破坏力”，“把当年的传统中国骂惨了”，“骂垮了”；现在“时代变了，中国变了，鲁迅的文化战略与战术也该变了”，该“换个调子”，“开始找点好话说说”了。因为“鲁迅的终极意图”就是“推翻那个旧中国”；他“配合毛泽东，完成了他的时代使命”，如果还让鲁迅“死而复活”，“步鲁迅的后尘”，像他那样“以杂文骂吃人的礼教，写小说讽刺土豪劣绅”，那就是“泥鲁”“自损”，就是“又想来击倒”中国了。一句话，旧中国不能“死而复活”，鲁迅的思想和人格也应永远死掉了。

这是近几年来贬低鲁迅思想和人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反映了对鲁迅的隔膜，其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鲁迅的终极意图”绝不仅是“推翻旧中国”，而是“立人”，是改革国民性，改变传统中国人世代为奴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人的现代化，达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目标。而所谓“鲁迅的文化战略”，不就是要让封闭、保守的传统文化向着开放、进步的现代文明转化么？虽然“时代变了，中国变了”，但民族解放、政治解放和经济发展，决不能代替人的自由解放，鲁迅的“立人”和人的现代化的目标，还远未实现，还是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奋斗目标，因而鲁迅的“时代使命”和“文化战略”也远未过时。

第二,现在的中国,的确大不同于鲁迅“当年的传统中国”,但也并非只有光明面没有黑暗面,并非没有传统旧礼教的残余和新的“礼教”,并非没有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因而也仍需要鲁迅式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勇于同一切阻碍中国和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东西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步鲁迅的后尘”,正是推进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维护新中国不垮的需要,决非什么“泥鲁”和“自损”。要是面对腐败而闭上双眼“瞒和骗”,一味“找点好话说说”,那才是对新中国的“自损”。

第三,鲁迅思想和精神、人格的生命力,是由其自身的价值决定的,并非谁要其死掉就死掉,谁要其复活便复活的。历史上多少想不朽的“伟人”如今有谁记得,而生前希望他的文章与它所攻击的黑暗尽快一同死亡的鲁迅,却至今仍然勃勃有生气,他的许多话竟像是对现在而言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所抨击的现象至今犹存,也说明他的见解深刻、超前,即反映了某种本质和规律性,并不因时过境迁而“死掉”,反而更显其先见之明。想想这一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想想人们所经历过的种种革命的成败,不是证明了鲁迅的远见么?

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意味着鲁迅所主张的“改革国民性”,改变人的精神不那么重要了?

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们精神的提升提供了物质基础,却不可能使深受传统浸染的“愚弱的国民”很快都变成现代新人。鲁迅当年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他从中国人非人生活的惨状和麻木的神情中醒悟到一个真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现在的中国人,物质生

活是改善了,体格也健壮多了,但在精神状态上,是不是都很健全,都没了奴性,都不再“愚弱”,也没了“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了呢?睁眼看看现实吧,多少住进了高级别墅的阔佬成了精神乞丐,多少“公仆”甘当金钱和权力的奴仆而成为罪犯,多少新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正在商界和官场上流行,多少“愚弱的国民”仍在祖传“昏乱思想”制驭下,向着祖宗、神灵和“救世主”们跪拜……只要你不存心“瞒和骗”,谁也不难看得明白: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绝不能代替人的思想、素质的现代化。甚至可以说,越是物质生活改善之时,越得关注人的精神、人格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关于改变人的精神和改良人生、重塑民魂的主张,仍是一种多么切合时宜的警示!

鲁迅的一切人生探求,都是为被压迫被奴役的劳苦大众设想的,用张学良的话说,“鲁迅是每一个不愿意作奴隶的中国人的鲁迅”。因而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而且更是中国底层民众的“民魂”。他与一切奴役者、权势者是无缘的,权势者和以权势者自居的“奴隶总管”们是不会理解他的。尽管鲁迅死后不断有人号召学鲁迅,并给他以种种最高的称誉,然而真正敢像鲁迅那样做人做文的却不多,也不易!

有的人以鲁迅作招牌,“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在尊崇、颂扬中加以利用。鲁迅在1928年讲到偶像崇拜时就说过:有些崇拜偶像者,原是不信偶像的,其崇拜,不过是拿来作傀儡罢了。1935年他讲到文字狱问题时又指出:“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不幸的是,鲁迅死后,他也成了被利用的招牌和偶像。人们一面宣传鲁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杂文最深刻有力,一面又把

那些真像鲁迅那样坚持独立人格、独立思考,敢写鲁迅式杂文者列为“异类”,打入“另册”。在这样的“尊崇”之下,学鲁迅岂不成了玷污鲁迅的一种招牌!

真学鲁迅,就得对鲁迅的精神、人格有准确的理解,否则,学起来也会变形、变样。例如有同志认为,学鲁迅“甘为孺子牛”,就是要“做人民的奴隶”。按照这种理解去学,显然只会学出许多丧失独立人格的新的奴隶和奴才(即所谓“驯服工具”)来。这种学法,与一生反对奴役和奴才意识,为追求人的自由解放而“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岂非南辕北辙!

鲁迅虽是中国最先觉醒的现代人,却并非什么圣人和完人。正如所有人都有其局限一样,被称为激烈反传统的鲁迅,也没有逃脱传统对他的纠缠和束缚。例如他激烈抨击封建孝道和包办婚姻,却真诚地尽着对他母亲的孝心,违心地接受了母亲给他包办的婚姻。因此有人说他像萧伯纳:“他过的是一种生活,而信仰的是另一种生活。”但他毕竟与众不同:他从不隐讳自己的局限和缺陷,并且比解剖别人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身上“古老的鬼魂”,表现出了一个现代人勇于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自觉。他自称是历史发展的“中间物”,又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我以为,他作为一个自觉地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有缺点的“精神界之战士”和“中间物”,比之那些明明是凡人偏要装圣人,明明是小人偏要充伟人者,实在更真实可学得更多。因此,尽管有人反对“仰视”鲁迅,我仍然觉得他值得景仰。我写本书的动力之一,就是出于对鲁迅的景仰,虽然我所写的也许只是我所理解的鲁迅为人的一小部分。